

刘续兵 / 房伟 © 著

文庙释奠礼仪研究

中华书局



文庙释奠礼仪研究

刘续兵 / 房伟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庙释奠礼仪研究/刘续兵,房伟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7.8

ISBN 978-7-101-12449-1

I.文… II.①刘…②房… III.孔庙-祭礼-礼仪-研究-
中国 IV.K892.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3498号

-
- 书 名 文庙释奠礼仪研究
著 者 刘续兵 房 伟
责任编辑 陈 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4½ 插页4 字数280千字
-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449-1
定 价 42.00元
-

本研究项目出版由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支持





目 录

导 言	1
-----------	---

第一章 文庙与文庙祭祀

第一节 文庙原始	8
第二节 文庙的发展沿革	18
第三节 文庙与释奠礼	24

第二章 文庙释奠礼仪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源流	30
第二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雏形	32
第三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定型	40
第四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高峰	44
第五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衰变	50

第三章 文庙释奠的仪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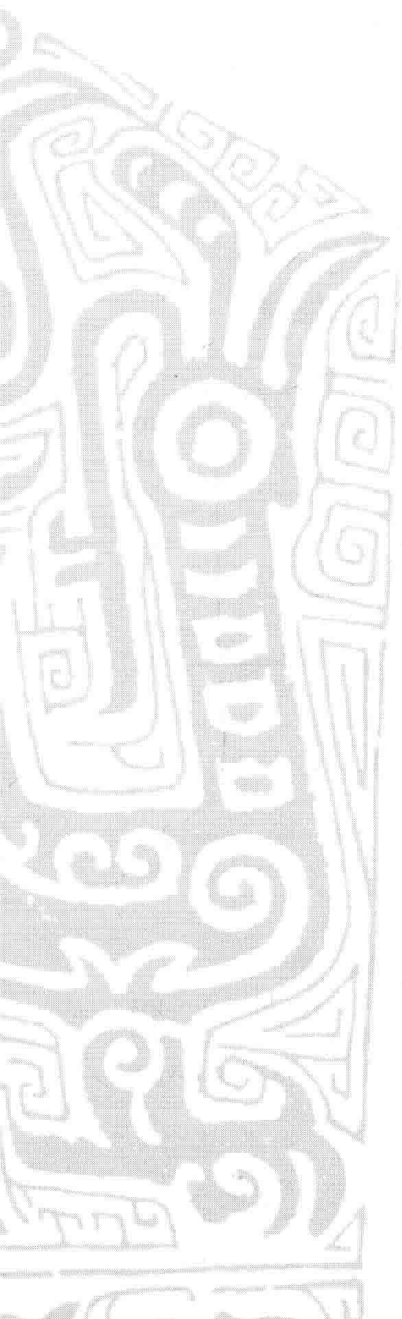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文庙释奠礼仪的构成	53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释奠仪程	69
第三节 明、清时期释奠仪程的比较	73

第四章 文庙释奠的从祀制度

第一节 文庙从祀制度的历史变迁	80
第二节 文庙从祀制度的构成	84
第三节 文庙从祀的教化作用	98

第五章 文庙释奠的思想文化内涵

第一节 文庙释奠的文化意蕴	103
第二节 文庙释奠的政治意蕴	107
第三节 文庙释奠的宗教意蕴	112



第六章 文庙释奠礼仪的延续及其新形态

- 第一节 港澳台地区的文庙释奠礼仪121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庙释奠礼仪127
- 第三节 国外的文庙释奠礼仪137

第七章 当代文庙释奠礼仪的构想

- 第一节 对当前文庙释奠热潮的反思150
- 第二节 文庙释奠礼仪存在的问题153
- 第三节 对当代文庙释奠的构想158

结语171

附录

- 一、历代对孔子的追谥174
- 二、历代帝王幸鲁175
- 三、阙里孔庙从祀“十二哲”176
- 四、阙里孔庙从祀先贤、先儒178
- 五、明代释奠仪程186
- 六、清代释奠仪程193
- 七、孔子故里曲阜“公祭孔子大典”仪程199
- 八、曲阜阙里孔庙“公祭孔子大典”祭文209

后记227

导言

世人习称的“孔庙”，实际应称为“文庙”。文庙是中国传统社会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其黄瓦重檐、雕梁画栋，无不寓意深远，有着特定的内涵。作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景观，文庙当仁不让地象征着孔子和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崇高地位。

一直以来，祭祀圣贤是中华文化“慎终追远”特质的重要表征。传统社会中，文庙正是用来祭祀孔子及历代儒家先贤、先儒的“圣域”。在古人看来，于文庙之中举行释奠礼以祭祀孔子及儒家圣贤，乃“国之要典”，“乾坤第一大事”。因而，中国历史上这一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蕴涵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一、文庙祭祀开创了一种新的祭祀形式，是中国“尊师重教”传统的重要标志

根据对象不同，祭祀活动大体可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两种。血缘性祭祀，更多的是亲情所系；而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



孔子去世后，其后裔定会于家中祭祀这位伟大的先祖，这无疑是由于血缘亲情的祭祀。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祭孔”活动，则首先出于孔门弟子自发所为。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依宅立庙，对孔子进行追思与祭奠。

孔门弟子对孔子的“祭祀”活动，乃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孔子与其弟子之间显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孔子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渊博的阅历学识加之以慈父般的关怀，赢得了弟子们的衷心拥戴和尊敬。在孔门师生这里，“孝”这种原本属于血缘与宗法范畴的伦理概念，已经超越了狭义上的亲情意义。

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使得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并行不悖，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正如李纪祥先生所言，“祭孔”成为具有流传与传承的文化大事，成为师生关系中的神圣性象征^①。

二、文庙祭祀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风向标，也是历代政治与文化关系的集中展示

孔子在历史上地位的起伏、儒学在历史上地位的升降，均可以在文庙祭祀史上得以展现。尤其可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发现儒学自身在学术、信仰等领域产生的变化。黄进兴先生对此有着精到见解：“历代孔庙从祀制无疑均是一部钦定官修儒学史，十足体现历史上儒学的正统观。”^②

文庙从祀制的确立与变化，直接地体现着儒家内部的学术风向。唐代贞观年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文庙，他们专注于儒家经典的传

^①李纪祥：《代代相传：祭祖与祭孔的血缘性与非血缘性传统》，《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5页。

^②黄进兴：《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承，乃“传经之儒”的代表，这与唐初崇尚汉代经学的学术风气有必然的联系。此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孟子、子思地位升格，颜、曾、思、孟“四配”开始定型，而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凌驾于汉唐诸儒之上——“明道之儒”地位上升，这无疑是理学道统观占据优势的直接体现。至清代，增祀贤儒中又出现了“行道之儒”，以诸葛亮、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他们的出现，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紧张、急需治世之才以力挽狂澜的状况有密切关联。

在儒者看来，对于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有所发明、有所维护、可以教化人心、具有“扶纲常，淑人心”之功者，就应当被升入文庙从祀。然而“孔庙从祀，非寻常事”，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治统一方的认可与节制。而历代统治者大都热衷于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由此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文庙祭祀作为国家祀典，为统治者所控制，黄进兴先生称之为“统治阶层的专利”，乃是“帝国运行不可分割的一环”，非一般百姓所能觊觎。^①

三、文庙祭祀还具有一定的宗教与信仰意蕴

历代不断地兴建文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及文化道统的确立。孔子并不像老子那样被道教徒们神化为教主，文庙祀典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的确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儒家所提倡的“四维”“五常”“八德”等社会教化准则，已经为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内化于心，千百年来一贯贯彻实行。所以，儒学与其他宗教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

^①黄进兴：《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不是一种完全神学化的宗教。

文庙祀典彰显了对于圣贤人格的推崇，是士人感受群体优越性和文化价值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一位儒者能够被纳入文庙祭祀，就表明他的“道德文章”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其在儒学史中的正统地位也就得以确立。曲阜的阙里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是儒生心灵的原乡之所，朝拜阙里，也成为儒士的宿愿^①。入祀文庙，对士人来说则已是近乎信仰了。传统社会下的儒生普遍认为，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②，以至于某些儒生“梦在两庑之间”，感叹“人至没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③。这些都体现了文庙祭祀对于士人群体的重要象征意义和心理抚慰作用。

文庙祭祀与经典的诠释、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共同奠定了士人对于孔子和儒学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但其对于古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完全可以与宗教相仿佛。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正是儒家优秀分子对于自身信仰和使命的自觉表达。

四、文庙祭祀从本质上讲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孔子有功于中国文化，文庙之设，即是为了尊崇孔子之道。文庙除了祭祀孔子本人，还以“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等历代儒家圣贤进行配享、从祀。从唐代以来，谁来配享孔子，谁来从祀孔子，都是官方研究决定的，而这些有资格配祀孔子的人，都是对儒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大儒。可见，文庙就是中国的“名人堂”“先贤祠”。由此，文庙祭祀的文化意蕴便不言而喻。明儒王世贞曾言：“文庙之有从祀者，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⑤文庙祭祀，首先在于尊崇孔子，为尊祀其教、

①杨朝明：《礼制“损益”与百世可知——孔庙释奠礼仪的时代性问题省察》，《济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②[明]瞿九思：《孔庙礼乐考》，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③[清]刘大鹏：《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④[宋]张载：《张载集·张子语录》，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0页。

⑤[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15《山西第三问》，《四库全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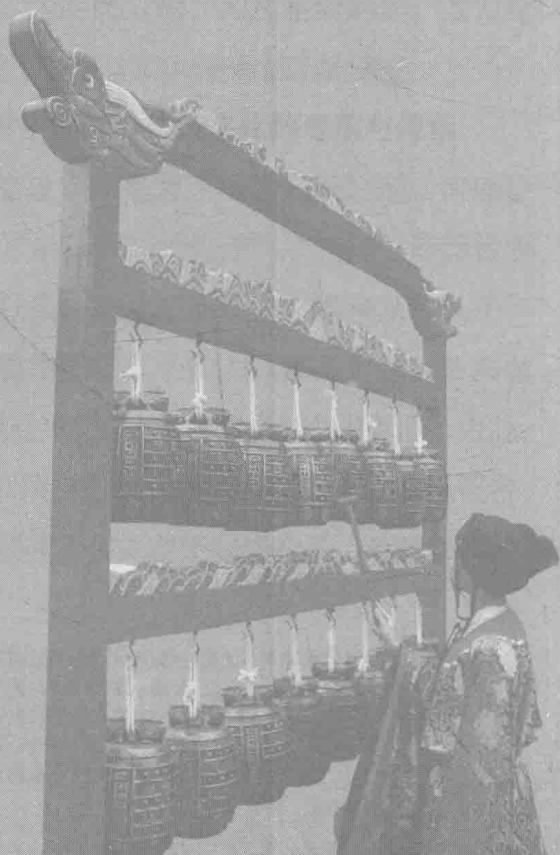
尊祀其道。同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衍续儒学道统，尊重以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懂文庙，才能读懂中国。

孔子祭祀既是孔氏族人祭祖的“家事”，又是中国人在文化上慎终追远的“国事”。今人祭祀孔子，也应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及其创造者们表达敬意的途径和方式，虽然这敬意对不少人来说已显得陌生和疏离。

绵延两千余年的文庙祭祀，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有极多内涵值得挖掘。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政治、宗教、信仰与文化史，具有极大的价值。

第一章

文庙与文庙祭祀



文庙的建造，始于孔子故里曲阜，最初仅是莹不过百亩，封不过三版，祠宇不过三间^①。经过后世的建设，文庙不仅在建筑数量上不断增加，其规模和品级也有很大提高。

在帝制中国，文庙是由国家统一修建的礼制性庙宇。其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奉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熊禾曾言：“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②此处“祠”即指文庙。孔子是儒学宗师，为道统之源，因而祭祀孔子，即是为了尊崇儒家道统。对此，明洪武年间的侍郎程徐曾言：

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③

程侍郎之言可谓精辟！文庙祭祀当然是为了纪念孔子，表彰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文庙祭祀更彰显了历代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体现出中国人对人生圆满、社会和谐的不懈努力与追求。

① [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11，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页。

② [元]熊禾：《熊勿轩文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8页。

③ 《明史》卷139《钱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81-3982页。



第一节 文庙原始

作为专门祭祀孔子及儒门先哲的国家礼制性建筑，唐宋以后，文庙遍及京师及地方各级行政区域，其建筑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提高，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庙”称谓的形成，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国学孔子庙被称为“夫子堂”，地方学校孔子庙名曰“宣尼庙”。唐开元年间，孔子被册封为“文宣王”，孔子庙又改称为“文宣王庙”。宋、金、元时，追随孔子封号的改变，其名称相继称作“至圣文宣王庙”“大成至圣文宣王庙”等。从明代开始，地方学校称作“儒学”，孔子庙也改称“文庙”。

文庙的不断发展，与孔子地位的抬升密切相关。自从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渐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后世统治者无不把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治国的纲领，儒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也因此受到特别的尊崇，成为人们特别是士大夫阶层顶礼膜拜的偶像，祭祀孔子的活动逐渐发展为一种国家祀典。文庙之兴盛实源于此。

一、文庙溯源

文庙的鼻祖，应追溯至曲阜阙里。据南宋时孔子后裔孔传所作《东家杂记》记载：“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这是关于孔子庙建立时间最早的记载，后世多从其说。如清儒陈锦所订《文庙从祀位次考》亦谓：“哀公十七年，即旧宅立庙以祀孔子。”但是，这个结论遭到了近代学者的质疑。讨论文庙祭祀，首先需要做的正是追溯文庙的源头。

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学”教师，不仅开创了划时代的“教

育史”，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按《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在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釐子卒，临终前命其子师从孔子。于是，“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不过，孔子真正开始大规模设坛讲学，大概从其三十岁开始。他晚年自谓“三十而立”^①，恐怕即是对此而言。从三十岁到七十二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②孔子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仁慈的关爱、宽容的胸怀、伟大的人格，赢得了众弟子由衷的信任和爱戴，孔门内“其乐也融融”。尤其是经常见于记载的十几位高足弟子，如颜回、子贡、子路、有子、冉有、曾参、仲弓、子张、子夏、子游等等，在长期跟随孔子的学习、生活中，与老师生发了极为深厚的感情，以后世之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喻之，亦不为过。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可以称之为“拟血缘关系”。

正因为人格上的巨大魅力、在思想上的巨大影响，孔门师徒间这种“拟血缘关系”其实已超出普通血缘关系所能传达的感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孔子对弟子早卒所表现出的悲痛之情。孔子最心爱的弟子颜回“短命早死”，孔子连声高呼：“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③这是孔子去世前两年的事情。孰料，祸不单行，第二年，另一位心爱的弟子子路去世。《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记载，当子路在卫国被杀之后，卫国的使者告诉孔子，子路被“醢之矣”时，孔子动情地“令左右皆覆醢”，长叹道：“吾何忍食此！”这是孔子去世前一年之事。于此二例，

①《论语·为政》。

②《史记》卷47《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8页。

③《论语·先进》。



我们可以见出孔子对弟子之深厚感情。

另一方面，从弟子对孔子的感情来说，同样表现了一种类似父子亲情又超乎父子之情的情感。《论语·先进》便记载孔子之言，“回也视予犹父也”，这自是实情。这种感情在孔子去世后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如《孔子家语·终记解》所记，孔子去世后，“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因为过去的丧服礼，并无为“师”服丧这一项，这属于前无成例可循的。这时子贡说：“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随后将夫子“葬于鲁城北泗水上”，殡葬“兼用三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于是，弟子服“心丧”三年，独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①。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于当时弟子及鲁人心目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体认，不难想见，公元前479年，当为王道理想奔波了一生的孔夫子在鲁国去世时，人们是多么的悲痛！三百多年后，司马迁游历曲阜，“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后写下了《史记》中的名篇《孔子世家》，其中对孔子去世后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憯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

“君其不没於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①《孔子家语·终记解》。